

超越差异探索文化的共通之处

——《利玛窦：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》评介

世光

(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1)

作者:世光,男,1985年生,北京大学历史系,电话:+86-188-1052-1146。电子邮件:18810521146@yeah.net,邮编:100871。

夏伯嘉^[1]的《利玛窦：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》是一部关于利玛窦(Matteo Ricci)的研究型传记,但和很多学术著作不一样,夏伯嘉的书是娓娓道来,仿佛他就在你身边讲述一个故事,带给人快乐和亲切。《利玛窦》一书带给读者最初的体验正是这份轻松阅读的愉悦感,历史学家如果能将枯燥的史料融入文章的血液之中,看似轻松随意的讲述背后浸透着史料的支撑,这便是大大的不易了。因此夏伯嘉说:“写得有意思,是对所有历史学家的挑战”。在书中,他从未用陈述观点和罗列史料的论文套路,把史料改写为场景和情节,恰如其分地安排在利玛窦的故事里。夏伯嘉描绘了欧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,在这个有据可依的历史故事里,读者跟随利玛窦的脚步,从意大利马切拉塔田园风光来到葡萄牙里斯本,登山风帆商船穿越好望角的漫漫海路,体验印度果阿酷热的雨季,经由澳门深入中国内陆,游历肇庆、南昌、南京和北京等明朝古城。利玛窦的人生起伏、喜怒哀乐,这些原本唯有在小说的中才能寻觅的东西,也经由生花的妙笔呈现在历史专著中。历史专著原本是块不好“啃”的硬骨头,但夏伯嘉却把他熬成了浓汤软粥,可见其文笔优美之境界。

《利玛窦》一书的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特点是,夏伯嘉融会贯通了中西史料,“本书是首部全面使用中西文相关文献的利玛窦传记”。在此之前的中国研究者和西方研究者,都只能从本国语言的角度分析利玛窦的史料,中国的学者主要从地方志、明人笔记、《明实录类纂》等中文史料入手,而西方研究者则偏重于利玛窦书信、耶稣会档案、梵蒂冈档案等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原始档案。中西学者之间往往缺乏互相对照,利玛窦的形象被人为分成中国人眼中的形象与欧洲人眼中的印象。但是,华裔学者夏伯嘉旅居欧美数十年,精通英语、德语、法语、荷兰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,因此,夏伯嘉打通了中西史料,破除了中西原始材料之间的隔阂,比较同一时期利玛窦的书信、记事,做出细致入微的描写。例如:“在1604年的圣诞节,耶稣会士用古钢琴和竖琴庆祝了三至四个弥撒,一些基督徒甚至参加了守夜。有些教徒因为勤奋学习拉丁祷文而让利玛窦印象深刻,比如李应试的妻子可以背诵认罪祈祷文,另一些人用他们的真诚悔悟打动了利玛窦……”这些细节散落于不同的语言的史料之中,夏伯嘉在融会贯通之后,将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,由此可见全面使用中西文献的意义所在。

夏伯嘉治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客观主义,这也闪烁在《利玛窦》一书的字里行间。朱孝远在

[1] 夏伯嘉 Xia Bojia,《利玛窦：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》*Li Madou: Zijincheng li De Yesuhuishi*, [Matteo Ricci: The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] 向红艳 Xiang Hongyan、李春园 Li Chunyuan 译, (上海 Shanghai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chubanshe, 2012).

《夏伯嘉——历史确定性的毕生寻觅》中这样评价他治史的客观主义：“透过像诗一般的文字，我们感觉到，寻觅历史的确定下，才是夏伯嘉的毕生追求。他和历史学结缘，也出于此。”笔者以为：对历史确定性的寻觅并不完整，应该从客观主义的层面剖析。在书中，夏伯嘉从未评价利玛窦言行的是非，没有一处轻易下论断，而是用描述性语言去呈现人物。他细致地描写利玛窦做出这些言行的背景和环境，让读者自己身临其境去体会利玛窦，换位思考古人的喜怒之情，每个读者对主人公言行的感受不尽相同，但这才是“有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。笔者认为能让读者感受到各自不同得利玛窦，这正是夏伯嘉秉持公允态度呈现客观历史的表现，这种不同恰恰是历史客观主义的最佳体现。

《利玛窦》全书围绕着一个有趣的比喻展开：耶稣会士来华传教，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一座大宅院。夏伯嘉把明朝的中国比作一座大宅院，有围墙、庭院、厅堂和内室。利玛窦之前的耶稣会士只是在围墙和门口徘徊。在利玛窦达到之前，诞生于反宗教改革背景中的耶稣会已然在明朝耕种多时，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。葡萄牙商人在明朝找到了生财之道，与之对比鲜明的则是耶稣会士在开垦中国文化上遭遇的挫折，前任传教士们表明，“中国人对基督教相当冷淡”，尤其是缺乏官方的指示，耶稣会士传教的需求往往还没有到达核心机构就已经被拒绝。这不仅由于难学的中文，还因为他们看待明朝文化的态度。狭隘的情感阻碍着中西方深层次的交流，被西方文化禁锢的灵魂是无法进入中国院落的。

“远道而来的利玛窦却闯进了这个院落。”利玛窦不仅仅是明朝宫廷中的外国人，更是中西方文化鸿沟的跨越者，“他成功探索了中国大院的内部构造，进入他们私密的领地”。他在语言上的勤奋无疑是最好的准备工作，帮他推开了明朝的大门，得以进入“富丽堂皇的大宅院”，曾经，利玛窦也希望“屋中之人随他而出，皈依天主教”。但是，进入院落中的利玛窦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，“他对大明帝国的文学、政治和物质文化充满了敬意”，这正是前辈传教士所缺乏的态度。只有充满感情的认可才会得到宅院主人的允许，进入院落中最精彩、也最隐秘的部分。利玛窦剃了须发，穿戴打扮与中国和尚一样，将自己描述为天竺国僧，希望借助明朝官员对于佛教发源地的天然情感来拉近双方的距离，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。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圣母玛利亚理解为送子观音，这和耶稣会士对自己信仰的坚持大相径庭，但是利玛窦成功进入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层面。他足迹遍布肇庆、南昌、南京和北京，热衷吸收中国文化，同时把西方的科学、文化和宗教传播到了中国。他去世之后，由皇帝下令安葬于北京西门之外。“他为传教士们的葡萄园扫清了硬土”。由他去世到1773年耶稣会被取缔之间，约有五百人来到中国传教，然而再无第二人能够享受他的待遇。利玛窦的智慧、魅力和坚持帮助他完成了这个过程。

夏伯嘉的结论是利玛窦是一位“畸人”，“畸人”意思是杰出的人，也可以指异乎寻常的人。利玛窦谙熟儒学，尊重中国风俗，穿着汉服，结交士子，巴结官员，缠斗和尚太监，这些让他得以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层——朝廷；但他见到中国的事情，都会与本国的情况比较。当他游历至南昌，查阅地方志中的户籍和人口数，他就想到这是佛罗伦萨人口的两倍；他坚信天主教，一直把使中国人皈依作为毕生的使命。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，按照明朝为人处世规则行事，但却并没有变成一个中国人，他骨子里仍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意大利人。利玛窦的杰出在于他跨越了文化的鸿沟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：“天主教中国传教区的奠基人，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。……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鸿沟。即使在400年后的今天，他仍是中国最有名的西方人士，因其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上的卓越贡献而被纪念。”

从阅读的角度轻松随意，从获取知识的角度严密谨慎，《利玛窦》一书做到了兼而有之。故事的背后，作者追寻的是一种长期身处异邦、超越中西差异寻找文化共通之处的情怀，私以为这才是夏伯嘉著书立说的出发点。超越中西差异去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，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仅要精通对方的语言，还要谙熟对方的文化，更重要的是怀着包容和欣赏的心态去认知他国历史和文化。任何人

都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枷锁中,但是不同的观察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,并无对错之分,出发点不同而已。夏伯嘉平静、柔和的语调向读者传递这样一种讯息:他以后世研究者中立客观的立场,以及对每一个人物的充沛感情去呈现历史。喜爱历史的人,往往有超越的情怀。或脱离了当下世俗世界中的种种现实问题,或跨越了阶层民族国家的限制,甚至能够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人类共同的情感。如果文字能够将这种情怀表达出来,那么读者便极易为之所吸引,甚至为之动容,形成精神上的共鸣。利玛窦之于夏伯嘉,夏伯嘉之于读者,便是这样一种相似的情怀的传递。

English Title:

**Beyond Difference: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s. A review of R. Po-Chia Hsia's
Li Madou: Zijincheng li de Yesuhuishi** [Matteo Ricci: the Jesuits in the Forbidden City]

SHI Guang, male, born in 1985, Ph. D. student of History Department in Peking University, Beijing, P. R. China, Tel: (86) 188-1052-1146, Email: 18810521146@yeah.net, Zip code: 100871.